



中国随笔

年度佳作

2012

耿立 / 主编

NIANDU JIAZUO 2012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随笔

年度佳作

2012

耿立 /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随笔年度佳作 . 2012 / 耿立主编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3.1

ISBN 978-7-221-10615-5

I . ①中… II . ①耿…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2026 号

中国随笔年度佳作 2012

Zhongguo Suibi Niandu Jiazu 2012

主编 耿立

责任编辑 张静芳 李璐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385 千字 印张 21.75

ISBN 978-7-221-10615-5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言：随笔之余

耿 立



1. 人之被称为人，是因肉身之上的思想。思想是一个人作为人的最显著的标志，无思想的人，无疑是奴役的对象，头脑简单和不动脑筋的人往往是被使唤的，上半身思索的人奴役下半身思索的人。

随笔的写作，不应是为写作而写作，而应是有了思想，或者最低的是有了感想，想传达给别人，让别人分享；写随笔的人很少能发财，手里只是握着一管笔，这笔管里汲取的是思想的汁液和夜里的星光。

散文是属于白天的，随笔属于夜晚和星空。

2. 随笔写作的积累，知识是重要的，但至为重要的是思想。思想就像我们的爱人，把对思想的爱等同于跟我们的恋人的爱一样，最理想的状态，我们和所爱的人缔结了婚姻，在文字里，我们也和思想走向了婚姻的殿堂，这样的婚姻没有离婚没有背弃。如果我们不把对爱人的炽烈写下，那就会在无尽的时间里遗憾地流逝，思想也如是。

3. 叔本华把文章作者分成三类：第一只写不想。这些人把自己的记忆、回

顾写下来，或者干脆直接从其他书里取材。属于这一类的作者简直是多如牛毛。第二则是在写作的时候也曾作过思考——他们思考是为了写作。这类为文者数目也不小。第三撰文者则是在动笔以前就想好了要写的内容。他们写作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做过思考。这些人为数极小。

这正如一座山，底座的体积最大，愈往上走，路越难走，人迹罕至。

4. 思想找到了合适的文字和艺术形式，便不再属于作者，思想有足，可远行；有羽翅，可飞翔。

5. 随笔之随，是自由的随便，是随便的自由，是精神的自治，不是为思想找技巧和形式，大匠无痕，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6. 不要把力量放在外在的修饰上，就像山野的女子，朴实自然，那是最大的惊人处。

7. 明白晓畅，唠嗑谈话，娓娓而谈，为这个世间的苦报慰，为黄昏的落日鼓掌，为新生的啼哭心颤，为下酒的花生咀嚼，为一切的天然本真留影，这是随笔的境界，矫揉造作是搔首弄姿，是伸舌头挤眼。

8. 随笔的思想也可能是犀利单纯，可能是晦暗是回味，大道低回。

9. 写出好随笔的首要的任务，是言之有物，再高就是思想境界，是艺术的气质。

10. 对女人来说，穿得越少，让人联想无穷的想法越多，对随笔亦然。赫斯奥德说：一半比全部还要多，让自己变得讨厌的秘诀就是把话全都说完。

11. 人说真理没有衣服，是说真理在赤裸的时候是最美的；表达真理的方式就是越简朴，所造成的张力越大，给人留下的印记就越深。

12. 形容词是多余的，动词是必需的。

目 录



序言：随笔之余 / 耿 立	1
黄泉路上蝶纷飞 / 李 零	1
利玛窦与“利玛窦现象” / 赵玉田	8
精神规则（四题） / 陈 原	13
风雅草木（二篇） / 刘梅花	24
亦诗亦僧亦梅花 / 吴昕孺	32
一支笔使一切痕迹成为可能 / 姚雪雪	41
纸上富贵 / 李清明	47
河流之死 / 黄金明	56
犯人的死法 / 狄 马	63
归宿不明的她们 / 李新立	74
拾的吃 / 刘亮程	78
童话书 / 王月鹏	83
铁箫声幽 / 宗 璞	95

流亡的知识分子：总是异乡人 / 梦亦非	99
狗 间 / 苍 耳	102
乡村笔记 / 向 迅（土家族）	111
乡村的性 / 孔 明	117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 陈徒手	122
天天向上 / 江少宾	129
告别“十月” / 王 炎	137
冉姓坝 / 冉正万	146
沙日拉咩绕，我的马 / 鲍尔吉·原野	152
妲己：千秋骂名美女无辜 / 王 立	155
如何可能写出失去母亲的哀痛 / 林贤治	161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 舒兴庆	166
畸人刘镇西 / 野 夫	169
颠覆赵高 / 乔忠延	180
文件中的王瑶 / 陈徒手	186
火焰与水晶的断片 / 高维生	196
学术的作用 / 史飞翔	201
蛮烟瘴雨的记忆 / 朱千华	203
冬天去青海 / 马 叙	207
花事（外三篇） / 草 白	214
人间草木 / 刘学刚	219
半球理论 / 马未都	227
明月文 / 周 涛	229
出走的肖恩 / 夏 榆	233
赞美苦难是一种虚妄 / 景凯旋	242
《古拉格群岛》到《红轮》 / 金 雁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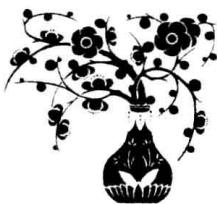
将军空老玉门关 / 章诒和	258
暗夜（外六篇） / 冯 杰	264
重温蔡伦 / 肖建新	278
始于一座陵墓的链接 / 虹 珊	284
不能遗忘的城市角落 / 李 汀	288
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 / 杨文丰	302
女人的白日梦 / 盛红娟	311
细碎的心弦 / 苍凉逐梦	315
黑暗中穿行 / 谷 禾	327
乡下之殇 / 庆 盈	337



黄泉路上蝶纷飞

——怀念我敬爱的傅懋勣先生

李 零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有个叫傅云起的女子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她带我到她在民族学院的家，我第一次见到傅懋勣先生。

我记得，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像个烧锅炉的，说话非常客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当我回忆起生活中的这一幕，常常会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邵循正先生。当年，我和张进京到他家做客，还是个中学生，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和大人没两样，居然推心置腹，跟我们谈历史，还从书架上抽书，拿书给我们看。

他们那一辈的老先生，我见过的人，往往如此，学问越大，人越谦和。在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傅先生永远是这样一副模样，甚至客气地向我“请教”。

傅先生的脾气真是太好了，什么事都不急不恼，淡然处之，这是优点。



但人太老实，老实到几乎逆来顺受，则容易被人欺，我想，这也许是他唯一的缺点。

日坛公园，离云起的新家不远。银杏树下，有一张长椅，日已西斜，天气很冷，我跟云起说，咱们结婚吧，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别问为什么。

回到永安南里，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哗哗流。我起身离去，下楼没走多远，迎面碰见傅先生。他说，怎么，你要走啊？别走别走，你看，我刚买了一条鱼，吃完饭再走。

但我还是赌气走了。

当时，我在山西插队，一介农夫，我爸是个长期挂起来的黑帮，没人管，没人理。他穷极无聊，变成读书人，经常去图书馆，整天胡思乱想。我家挤进两户人，该搬的搬，该卖的卖，要什么没什么，特别是钱。

傅先生在永安南里十号楼的房很小（很晚，他才搬到七号楼），两屋，大屋一张床，小屋一张床，上下铺，他买了几个柜子和躺箱，堆放杂物，生活很艰苦。“文革”中，他受过很多罪，但你从未听到他为任何事抱怨。

我们没办婚礼，领完证，只是买了点枕套被面，两家坐一块儿，吃了顿饺子。大姐和姐夫送了个半导体，熊猫牌的。多少年过去了，这东西还在。有一次，清明扫墓，云起把它的开关打开，放在戏曲波段，留在了傅先生的墓前。他喜欢听京剧，自己还拉京胡。云起说，让爸爸听听京剧吧。

当时，我爸爸迷上三件事，戎狄史、双拼方案和沁州方言。

晋东南是赤狄活动的中心。他老说，他是戎狄的后代。双拼方案，他一直在鼓捣，周围还有一伙人参与。傅先生参与过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并不同意以拼音作文字，但仍然帮他梳理思路。沁州方言是他的家乡话，傅先生也帮他用国际音标记音，对这个业余爱好者很有耐心。

他管我父母叫大哥大嫂，一直这么叫。

我最怀念那段贫贱相守、苦中作乐的日子。

傅先生爱我，爱我是个读书种子。我的早期研究，无论《孙子兵法》，还是楚帛书，都得到过他的关心与支持。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文物》杂志上读到任继愈先生的文章，是关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我跟他说起，他马上说，任先生是我的同学。我带你去看他，你可以当面向他请教。当时任先生住中关园。

我手头的那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就是他特意买了送我的。

一九八三年，为我离开考古所的事，他还找过夏鼐先生。

他曾教我国际音标，一个音标一个音标念，我录了音。他还想教我学纳西



文，我说，光我们那点儿甲骨、金文、简牍，已经够累了，您饶了我吧。

他并不怪我。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他是第一任会长。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们那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名字不对，我们这个学会才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他们在民族文化宫办过一个民族古文字展，我去看过，很棒。

他用纳西文给我们写过一幅字，看不懂，最后有段话，大义是“云起、晓风，善体其中未雨绸缪之义，勿临渴而掘井”，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傅先生的一生，我知之不多，但有一首诗，我一直记在心里。他去世时，盛成先生写了这首诗，八句话，似可概括他的一生：

齐州自古产奇材，登降红楼负笈来。
问字通儒终入室，留英桥校远寻梅。
东巴经释成名作，民族语标出总裁。
桃李长辞先我去，奈何孤耋对灵台。

让我试着解释一下吧。

第一句，“齐州”，古代指中国。盛先生说，中国自古就出人才，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奇才。傅先生是奇才，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山东自古出学者。管、晏，山东人；孔、孟，山东人；孙武、孙膑，山东人。先秦诸子，多半是山东人。当代大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张政烺，他们也是山东人。傅先生是聊城人。聊城出了个傅斯年。过去有人说，傅先生是傅斯年的亲戚，这是误传。我问过他，他说，不对，聊城有两个傅，孟真（傅斯年）师出状元傅（傅以渐之后，出自江西），我家出御史傅（傅光宅之后，出自山西），不是一支，我家贫寒。现在，台湾史语所还保存着这两位傅先生的通信。

第二句，是讲傅先生上大学。他是一九三五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即我现在的单位。但那时的北大在沙滩红楼。这之前，他上过师范，教过小学。有一回，张政烺先生跟我说，他比我岁数大，但家境不好，入学晚。我们系的阴法鲁先生是他的同学。万安公墓，傅先生的墓碑，就是请阴先生写的。抗战爆发，傅先生随校南迁，他是在昆明毕业。一九三九年，他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跟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读研究生，机会难得。但为了弟弟上学，他决定放弃学业。傅斯年先生说，不行，我每个月给你五十块大洋，你给我继续学，他没接受。此事让他铭感终生。

第三句，是讲傅先生的师承。他学语言文字是师从罗常培先生。当年，吴



晓铃先生跟我们说，你罗爷爷（云起她们一直这样叫）学问大，脾气也大。罗爷爷的学问，全让你爸爸继承了，我继承的是骂人，谁骂人也骂不过我。我想，“问字通儒”一定就是这位“罗爷爷”。

第四句，是讲傅先生到海外留学。一九四八年，傅先生到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一九五〇年获博士学位后，他本有机会在剑桥当教授，但毅然返国。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让大家充满希望。

第五句，是讲傅先生的成名作。抗战期间，他在西南搞田野调查，下过很大工夫，特别是对纳西文和彝文。《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一九四八年）是他的成名作。这书是华中大学出版。他在华中大学中文系当过教授和系主任。一九九六年，于省吾先生百年诞辰，我在吉林大学开古文字会，姚孝遂先生问，傅先生身体如何？我说，他不在了。是吗？怎么没通知，什么消息都没有。姚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眼里闪着泪花说，我是傅先生的学生。

第六句，是讲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后，先回华中，后调北京，先在语言所，后到民族所。当时，民族所分两摊，翁独健先生负责民族史，他负责民族语言。他的确是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三军之帅，不仅对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有大贡献，写过很多专书和论文，还为民族文字的改进、创制和规范做过大量工作。从西南到西北，中国的兄弟民族忘不了他。不过，话说回来，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夺去了他太多的学术生命。不然，他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比如，他的另一本研究纳西文的专书——《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上册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下册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就是他在日本访问期间写的。解放那么多年，这是他唯一闲下来的一段时间。

最后两句是写伤悼之情。盛先生比傅先生大十二岁。傅先生只活了七十七岁，先他而去，他不胜惋惜。

盛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用法文写过一本小书——《我的母亲》。这书，写他的母亲，写他的家乡，轰动法国。一九八五年，法国把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授给他。国内获此殊荣者还有巴金先生。他的回忆录——《旧世新书》也很有意思。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从中国的“二七大罢工”到法国的“五月风暴”，很多重大事件，他都是当事人。这本书的引言，一上来就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土地上的人”。

柳下惠为官三黜，有人劝他：你干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杨绛先生说，她和钱锺书回到中国后，再也没离开中国。他们都是“不去父母之邦”。

古诗，写离别最多。生离和死别差不多。

孔子去鲁，回首国门，不忍离去，丢下一句话：“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

这样的话，今人很难理解。

盛先生说：“一九四七年我出国，回来是一九七八年，在外三十一年。”当他一过罗湖桥，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他说：“我握住解放军战士的手，眼泪滚滚而下。”

他们那一代人，不管学问多大，差不多都如此。

盛先生如此，傅先生也如此。

傅先生不爱运动，身体比较弱（“文革”中被拷打，恐怕也是原因）。晚年，他走路有点蹒跚，眼睛有点混浊，听觉也不太好。

一九八七年，他终于病倒了，先在中日友好医院检查，说是肠胃出了问题，需吃中药。

他开始每天到日坛跟人学打拳，希望有助于恢复，可惜已经晚了。

后来，他到协和医院检查，确诊为癌症，但说不清什么癌，到死也没查清。

一九八八年，他住进协和医院，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

他们每天查这查那，做各种实验，做记录，不像看病，更像研究病。

西医，回天乏术，让家属很无奈。

于是，各种气功师出现了。

那一阵儿，我还记得，气功热真是如火如荼。一会儿说某某山某某洞，里面坐一人，指甲长得可以绕身好几圈；一会儿说某某高人可以搬银行里的钱，拿出来，再放回去。还有人说，他可千里发功，叫你心脏骤停，甚至呼风唤雨，灭森林大火。王朔有篇小说，主人公忽然说，他开了天眼，自称能隔着衣服透视诊病，把办公室里的女同志吓得乱跑；后来飘飘欲仙，拔脚飞升，干脆从楼上跳下去。种种传说，让我想起《列仙传》，好像回到了东汉。

装神弄鬼，我从不信，但有人信，很多人都信，即便原先不信，到了鬼门关，也不由你不信。病笃乱投医，乃人之常情，至少是心理安慰吧，我这么想。

傅先生在医院，非常虚弱，只能听人摆布。

先头，他还能说话，后来就不行了，表情很痛苦。



当时，家中请了各种高人，高薪聘请，车来车送，还得做饭，一来一大拨儿。

这些人去医院发功，协和不让进。他们跟医院较劲：我不排斥你，你为啥排斥我？你就说，还有多少天吧，我保证超过你。

但一架将要坠落的飞机，机头拉不起来，多飞一会儿再扎下去，有意义吗？人只是多受罪，我想。

反正西医也没辙。护士跟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爱干啥干啥，我们就当没看见。

有一次，这批气功师来家里，我在一边看书，看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属于医书部分。他们凑过来一瞧，别提多兴奋，大呼，哎呀，这么古的书，里面肯定有古人留下的气。

眼看不行，云起飞回来了。

云起找到一位国防科工委负责气功组织的人，家住黄庄，很客气。他说，别哭别哭，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当时我在场，印象很深。

此人介绍说，北京的气功师分三个层次。强身健体，只是最低层次。比这层高，是可以治病。但这种气功师，看病不看人，就病医病，治不了大病。治大病的高人，反过来，看人不看病，同样的病，你的病，我能治，他的病，对不起，因人而异。看病先要相一相，只有上升到这一步，才能治癌症，但这也就是通常说的迷信了，你信不信？

后来，云起按他给的号码打过去，通了。对方问，病人叫什么呀？云起说，傅懋勣。对方问，病人是干什么的呀？云起说，普通知识分子。对方说，对不起，我还有外宾和首长要看，抽不出身。

第二天，傅先生就不行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病人都睡了，只有床头的小灯开着，惨白。

我和云起在病房。

傅先生的病房是在地下，房间又高又大，里面有一大堆病床，简直像个候车室。任继愈先生回忆，他去看傅先生，竟然是六人一间。他愤怒地说，像傅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安排一个单间。其实他看到的病房还是在楼上，比这个病房不知强多少。后来，医生说，楼上不如楼下方便，他又被搬回地下。有个气功师说，也好，这样可以接地气。

傅先生骨瘦如柴，我抱过他，分量轻得难以想象。我一想到病床会硌着他，心里就像过电，嗖地一扎。他的所有感官已无法与外界交流，中间隔着无声的黑暗。



云起出去找大夫。弥留之际，只有我在身边。我把他干枯的手轻轻握在手里，手是他唯一连接这个世界的地方。

我是眼睁睁看着他离去，气如游丝，逐渐被黑暗吞噬。

我出来，跟云起说，爸爸走了，把泣不成声的云起搂在怀里，医生、护士冲了进去。

火化那天，安琪和我坐在一个小天井里，静静等候。

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他说，唉，多少种外语，多少种民族语言，一切的一切，全都烟消云散，说没就没了。

我仿佛看见，他说的东西，像一只只蝴蝶，从炉膛中飞走。

当时我没哭，但回到家，夜深人静，不禁泪如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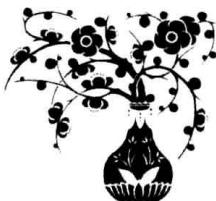
附记：这篇短文是为傅懋勣先生百年诞辰而作。感谢云起、东起、京起、安琪，是他们帮我回忆，订正了不少失误，并反复核对，提出修改建议。

(《读书》2012年第1期)



利玛窦与“利玛窦现象”

赵玉田



利玛窦（1552—1610，Matteo Ricci），号西泰，意大利人，来华耶稣会士，晚明轰动一时的公众人物。是时，利玛窦以渊博的“西学”享誉士大夫中间，又以华言华服的“夷人”形象令晚明众多百姓惊诧不已。时人称：“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二《跋二十五言》）利玛窦自称：“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事实上，晚明时期，利玛窦不仅是一个奇特的外国人及“西学”代名词，且与晚明的“利玛窦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

救时与“利玛窦现象”

晚明时代实则滥觞于成化时期。成化时期，明朝经过百余年相对稳定的发展，以经济生活商业化为表征的社会变迁开始萌动。换言之，自成化以来，明代经济社会近代化转型已成为时代主题。



至万历时期（1573—1620），随着城乡商品经济迅速滋蔓与膨胀，明代整个社会已经陷于原有经济秩序及道德观念崩解之际的浮躁与混乱之中。与社会变迁相伴生的，是日趋严重的传统社会危机、统治危机及更为深远的儒家思想危机。国事维艰，为了救时，晚明一些尚有政治责任心与道德良知的士大夫心存忧患，积极寻求挽救危机的救世良方。其中，成化、弘治之际，明代大儒、中央重臣丘浚曾致力于总结历代治国思想及明兴百余年政治得失经验，具体提出以“养民”为核心、以“为民理财”及“崇教化”等为途径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丘浚：《大学衍义补》）；正德、嘉靖之际，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等拟通过提倡心学以求改造世人精神，挽救社会危机；其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宣扬“百姓日用之道”说，从民生视角探寻国家出路借以匡济天下。除去上述思想家们在“思想”层面的积极探寻，嘉靖以来，明朝地方大员如庞尚鹏、欧阳铎、潘季驯、海瑞等人亦试图改革赋税征收办法以解救晚明困厄。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集其大成。张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统治危机暂时有所纾解，然而，未能根除。万历十二年（1584），曾“威权震主”的张居正身后遭到万历帝彻底清算。摧毁张居正势力后，万历帝很快就“转业”了，此后三十余年间，他“隐居”深宫。皇帝怠政，政务废弛，社会危机加深。是时，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兵变、民变迭兴，反矿监税使得市民运动骤起。在此人心思变、国事不堪之际，救时成为时代最为迫切的课题。

风云际会，利玛窦等饱学的耶稣会士们恰于晚明之际携带“神奇”的“西学”远渡重洋来传教。重科学、重实用的“西学”令一些陷于思想困惑、国事迷茫之中的士大夫为之一振。如徐光启等认为，“西学”为救世之学，“天主教”便是改造人心社会之良方，即“国家致盛世、保太平之策，无以过此”（《徐光启集》卷九《辨学章疏》）。于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晚明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遂倾心于西学，主动交好利玛窦“学而时习之”，欲借西学以挽救明朝统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凡此，最终形成晚明时期特殊的政治现象——“利玛窦现象”，即晚明士大夫以译介西学为主要途径，以端正人心、富国强兵为依归的自觉的学习、提倡“西学”以救时之举。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救时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标志着晚明一部分士大夫为了救时而从最初强化儒学治国功效转向求助西方科学技术，从推崇儒家思想而转宗天主的一段极为复杂而艰难的心路历程。因此，“利玛窦现象”不仅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时的现象与模式，也是晚明士大夫救时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